

名家访谈

“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生活形态”

盛可以 傅小平

一只鸟只有用自己的翅膀飞翔,才有自在愉悦,才能抵达理想的地方



盛可以,上世纪70年代出生于湖南益阳,后移居深圳。著有《北妹》《野蛮生长》《息壤》《建筑伦理学》《女猫》等。作品被翻译成二十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发行

VS



傅小平,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于浙江磐安,现居上海,著有《四分之三的沉默》等多部作品

傅小平:去年,你出版了中篇小说《建筑伦理学》和短篇小说集《女猫》,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响。我看到有读者感慨,终于读到你的新作了。其实在我的印象中,你这些年写书出书就没停歇过,只是有些作品大家没关注到罢了。也因此,我们不如从还没有被广泛阅读的长篇小说《女佣手记》谈起。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,我不时联想到林白的《妇女闲聊录》。两部作品主角都是进城打工的女性,故事也主要由主角讲述,或者说由妇女之间的闲聊铺陈开来。《妇女闲聊录》由很多片段组成,从写作手法上看也是偏于非虚构式的笔录。而你的这部小说还属于我们通常理解的小说的范畴,也有着小说式的起承转合和推进逻辑。

盛可以:林白老师的创作尤其在女性领域的探索是一面飘扬的旗帜,很少有人像她那样勇气坦荡与才情兼具。我没有看过《妇女闲聊录》,当时身边总有朋友在赞美这部作品,一直没有阅读机缘。写《女佣手记》是偶发事件。我在老家闭关创作时,有一个亲戚给我做饭。我问起村里的某某人现在怎么样,她就会跟我讲这个人这些年的事情。这位亲戚当保姆近二十年,在这一行业领域算得上见多识广,那些进城当保姆的女人,常有鸡飞狗跳的事,她好像无所不知。

傅小平:但我也觉得,你的小说体现出实录的特点。可以想到,你在写的过程中,是否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真实见闻,或者融合了非虚构的手法。

盛可以:这部小说里的事情,几乎都是我这位亲戚跟我讲的,什么类型的人都有,叙事者的声音,也就是她留在我脑海里的声音,算得上是某种形式上的实录。保姆的世界自成一体,自有她们的世界观、价值观、婚恋观,很多人会觉得她们的社会和我们社会似乎是剥离开的,但显然不是。

傅小平:保姆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,她们能在不同生活、家庭中流动,并和很多人有交集。所以听她们讲故事,给人感觉真是见多识广。当然她们大多没能真正融入上层,小说里风嫂的遭遇应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,她像是被裴主席给耍了,小说结尾很有戏剧性。不妨说说为何选择保姆作为切入点?

盛可以:潜到深水里才能看到鱼的世界。我有时羡慕保姆,她们不断地深入不同的家庭,介入别人的生活,窥见他人的隐私,看到表象背后的本质,她们简直就像田野调查者一样,从现场获得真实的一手材料。这些家庭里有不同类型的人,呈现不同的家庭结构,有各自不同的遭遇,用社会学观点看,婚姻与家庭既是私人领地,也是社会领地;婚姻从表象上是个人行为,从本质上是社会行为。正是因为婚姻家庭的社會属性,社会问题在家庭中得到充分反映。我非常熟悉保姆,认识不少保姆,她们聊某个东家的富有和吝啬,因为不小心打碎一个饰品吓得手忙脚乱,魂飞魄散,有些事听起来觉得既有趣,又心酸。我从没想过我会写保姆这个群体,更没有刻意选择保姆这个题材,而是故事掉在脚下,我弯下腰捡起来,擦拭擦拭,摆在人们看得见的地方。

傅小平:值得人们“看见”的,还有贯穿小说始终的毛小花这个人物。她好不容易考上了省重点大学,却为庇护不争气的哥哥,把自己出卖给了钱老板,此后长期依附于他,彻底丧失了独立性,最终结局悲惨。从旁观者的角度看,她分明是作茧自缚么,这和我们一贯主张的女性解放的诉求背道而驰。当然这样的事例在社会上客观存在,我们要问的不是娜拉出走后怎么办,而是娜拉没出走留在家里会有怎样的出路。由此可以探讨一下我们这个时代里女性如何独立的话题。

盛可以:毛小花原型是我们村里的,聪明漂亮,大学考上省一本,这很不容易,很遗憾她做了一只金丝雀。在富贵囚笼中,她曾经挣扎,想独立,想飞出去,但是已经与社会脱节,而且不适应辛苦工作和那点薪水。我想说的是,我们赞赏出走的娜拉,但身边更多的是走不出去的娜拉。她们为什么不走出去或走不出去,毛小花的故事提供了一种答案。前一天看了一个视频,一个女人自述如何从糟糕的家庭生活中走出来,这使我看到了女人脚下的泥泞,不会再是气愤地想“她为什么不离开他”,而是更能理解毛小花或她们的处境。

傅小平:理解理解,你对毛小花们显然是持批判态度的。

盛可以:在我所有的小说中,很少有妥协放弃软弱寡断的女性,即便是《北妹》当中没读过多少书的钱小红也始终坚定地追求独立自由与梦想,我欣赏女性的顽强独立,敢于和不公平抗争,敢于对命运说不。毛小花是悲剧性的,

耽于安逸享乐的生活,将命运交托他人,依附他人,不独立自主,不塑造自我,在得失中挣扎,非常遗憾。她的羽毛充满自信与美丽的光泽,但失去翱翔的天空更黯然失色。一只鸟只有用自己的翅膀飞翔,才有自在愉悦,才能抵达理想的地方。

傅小平:想到小说结尾,周嫂追潮毛小花坠楼原因。她自说自话道:“媒体说她得了忧郁症。我不晓得忧郁症是什么东西。”这个结尾有较强的反讽性。显然,无论是作为作者的你,还是作为讲述人的周嫂,都不能认同这样的结论。媒体报道放过的地方,也恰恰是小说可以深入剖析和表现的地方。

盛可以:这是个复杂的问题。新闻告诉人发生了什么,小说展示为什么发生。小说提供文本,呈现肌理纹路,作者不能也不宜下结论。我们也不好将一个人的悲剧,完全归结于其个人原因,应该有更深层的分析探讨,有更广泛的讨论关注。

我可能抛开最敏感、最真挚、最困惑的感情,而去写于我比较疏远的事物

傅小平:总体感觉,你也常从知识女性角度切入女性话题。《女佣手记》里是毛小花,《息壤》里是初雪,你笔下的知识女性或许在理论上奉行女性主义,在生活中却不能践行。

盛可以:事实上我关注更多的是《北妹》中的钱小红那类女性,她们没有什么伟大理想与人生目标,逆境中活着,野性、卑微,却有着强劲的生命力。我写的知识女性,几乎总是失败的,仿佛知识使她们更易受束缚,反而少了一股勇往直前的力量。人们对女性主义者的刻板印象最明显的一点是“男人婆”,谈起来都要嗤之以鼻。其实如果真正了解女性主义,其本质是反对性别歧视、性压迫、性剥削,促进性别平等以及维护女性的权利、权益等等。初雪想要孩子,充当母亲,我不知道母性跟女性主义是否有冲突,个人觉得女性主义者不一定是中性、雄性的样子,孕育生命是伟大而神奇的,拒绝孩子应该与是否支持女性主义无关。

傅小平:也是难得。你对文化人或知识分子,尤其是已婚的男性知识分子的批判可是毫不留情。《道德颂》里的水荆秋、《息壤》里的夏先生都是如此。

盛可以:我不会对知识分子怀有偏见,但也从不认为知识能将每个人塑造成真善美。人性和阶级、阶层、肤色、种族、教育程度都没有关系,至于人性之初是善还是恶,孟子和荀子早就探讨过。每个人心里都住着魔鬼或天使。当然《道德颂》并不会去认定人物行为的善恶,事实上也无法认定,也许对一方来说是恶,但对另一方来说又是善的。所以《道德颂》要讲的不是善恶问题,甚至不是人的道德问题,而是人如何面对满地鸡毛,穿过荆棘,冲出自己创造的牢笼。

傅小平:从《水乳》《喜盈门》《小生命》《算盘大师》《息壤》,到《女佣手记》等,你的小说或多或少都在以隐晦或直接的方式探讨两性之间的关系,为什么会对这一主题表现出这样的探索热情?

盛可以:我从小深受性别问题困扰,并且心怀恐惧,这些“不良”的东西附在我的成长中,

越来越庞大,越来越沉重,常让我不堪重负,直到有一天发现书写的魅力,自然就用写作方式来梳理这些问题,试图找出答案,或者说表达出来,希望获得答案。

从处女作《北妹》开始,写了二十年,包括十部长篇,以及为数不少的中短篇小说,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是围绕女性生存、女性命运、女性觉醒等主题创作的。对女性的关注几乎是天然的,甚至不是我选择了女性这样的主题,而是她们自动跳到我的笔下,根本用不着去寻找。我不可能抛开最敏感、最真挚、最困惑的感情,而去写于我比较疏远的事物。直到现在,我也觉得大部分女性应得到更多关注、更多帮助。我笔下的女性大多会维护自己的尊严,顽强走出现实困境,她们独立自强,敢于抗争,勇于反抗。

傅小平:经验也是个关键词。你在《缺乏经验的世界》里说,经验与女人相连……它们掩盖了女人身上天然的气味,那种小鸟依人的女人,冷不防就能把你身边的东西夺了去。该怎么理解你所说的“经验”?

盛可以:经验是好东西,但是在两性关系中,经验会导致过于现实、失去想象力与浪漫色彩。在这方面,无知时才会纯粹,才会动人,才有美好,才义无反顾。少年是面镜子,映照出女人的经验,那是瑕疵,是斑渍,是自惭形秽。于是经验反倒成为阻碍,成为障碍,成为反省。此时该怎么呈现自己,这是女人面对的巨大问题,直到火车到达终点,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,受困于经验,被经验所缚。

小说思想性不单单由人物言语表现,而是由整个故事所呈现。难的是让人物自然地说出思想,艺术地镶嵌在小说中

傅小平:我记得你好像在哪里说过,你的写作在《道德颂》后发生了转折。不妨说说这个转折是怎么发生的?

盛可以:2005年写完《道德颂》,我觉得我对两性关系的探讨已走到了尽头,两性战争不会再成为我的小说主题。我寻求一种更开阔的视野,一种更有意义的书写。后来我接触到一些朋友,当我为写作苦闷时,他们跟我谈过的观点和经历浮现在脑海中,推开这扇窗,意义深远,一束光投向了写作的黑洞中。暂不论自己有多少才华,我感觉这些年的写作充实而又愉快,没有违背内心意愿。

傅小平:就我的阅读,大概也是从《道德颂》开始,你的小说里多了一些议论。当然这些议论,不是说你作为作者直接发表看法,很多时候,你是让小说里的主人公——那些诗人、记者、教授,或许可以说是你的“分身”发表自己的见解。我不确定是你自己很有话说,所以想借他们之口来说,还是你自觉地追求小说的思想性,而有意识地强化这些内容?你觉得它们之于小说本身重要吗?我这样问,也因为当下有些小说在思想性上偏弱。

盛可以:每一部作品,实际上都是作者有话要说,也就是主题、核心。人物发表观点,一方面是凸显他们的性格与思想,加深人物印象,另一方面也是铺垫或推进情节,突出主题。有的作品中人物可以高谈阔论好几页,作者会根

据人物特征而设定他说什么,怎么说,以及为什么这么说。一个乡野村妇可能会说出朴素粗俗的生活哲理,而文化人,比如诗人教授,必然会有与身份相符的言行举止,比如忧国忧民、批判社会、质疑、反省、正义感等等,对话设置也都是为加强小说的主题服务的。小说的思想性不单单由人物言语表现,而是由整个故事所呈现、所探讨的。让人物自然地说出思想,而不是掉书袋,将之艺术地镶嵌在小说中,这并不容易。

傅小平:不只是不容易,还非常考验作者的写作功力。就我的阅读感受,你的小说里的议论,倒不是那种通常意义上公式化的议论,更多时候是夹叙夹议。这方面,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?

盛可以: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可谈。我始终是摸索着前进的新手状态,有时候某个选择并不一定是考虑很多的结果。我们看到那种厉害的作家,往往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力,在我们忽略或避免的环节写出了光彩。

傅小平:可不是,往往是这样。写作无定法,都说忌议论吧,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作家,写起议论来却是神采飞扬。为什么?因为他把议论充分小说化、文学化了。我注意到你在一些小说里,都借人物之口,对“浪漫主义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

盛可以:现在的社会 and 人群都过于务实,缺少对生活和世界的想象,没有努力追求并实现某种价值的情怀。我想用小说中的人物弥补这种遗憾,一个人应该有憧憬,有梦想,满怀激情,并有改变世界的冲动,甚至堂吉珂德式的浪漫。

傅小平:这可以算作你爱写比喻的一个隐喻。实际上,隐喻有时就得靠议论传达出来,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把议论或者谈论场景化。像《息壤》里围绕初秀是不是该把孩子生下来这件事展开的“谈论”,在我看来是这部小说最精彩的篇章之一,而且能见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常有的那种复调的特性。

盛可以:《卡拉玛佐夫兄弟》里面的对话,一个人动辄说好几百,但是一点都不枯燥,简直是太精彩了。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丰富性,他的人物不管说出怎样的长篇大论都不夸张,真实自然,合乎角色身份。在关于灵魂、关于救赎、关于信仰等等深刻的主题面前,角色的谈论,自然会涉及深层次的东西,作者也必须具备思考能力。我个人觉得小说中对话部分最难写,最考验能力,如何拿捏,语气,内容,暴露多少信息,掌握不好容易画蛇添足,浅薄化……写对话最容易暴露作者的底子。像海明威有些短篇只凭对话推进,一般人做不到。

傅小平:顺便问问你,在经历这次井喷式写作后,对以后的写作还有什么期待?

盛可以:写作对我来说,是一种生活方式,一种生活形态。我是在写作中活着的。就像别人一睁眼就想着要去上班,我早上醒来就想着写作,晚上睡下想明天读哪本书。但是最近经历中年危机,就是觉得还没搞清楚人生怎么回事,忽然发现太阳已经偏西,什么事都没开始做,辜负了最好的时光,有一种惶恐与消极。福克纳说,写点东西的人全都悲惨地受到两种力量的撕扯,一种是想在世界上当个人物,另一种则是对自我的带病态的兴趣,我只剩后一种了。但愿阅读和写作依然是支撑我活着的精 神力量。

